

感恩办书屋 知识惠乡邻

□本报记者 黄尚恩

在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有一个向全镇的中小学生和农民免费开放的作家书屋。这家书屋拥有250平方米的藏书馆和农民阅览室,馆内收藏了农业、教育、文学、历史等各类图书4万多册,农业科技光盘200多张。安徽出版集团编审金兴安创建的这家书屋,受到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学生的普遍欢迎。

蒋集镇作家书屋寄托着金兴安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感激。金兴安在蒋集镇出生,成长在这片位于江淮分水岭的贫瘠土地上。1960年,刚上小学二年级的金兴安遭遇重大人生变故,父母双双离世,他孤苦伶仃、衣食无着。在那个特殊年代,乡亲们生活也是举步维艰,但都齐心协力地关心、爱护着这个孩子。靠着东家大婶送碗粥,西家大叔送碗汤,金兴安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金兴安说:“我是吃百家饭,百家家长大的孩子。从那时起我就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报答乡亲们。”

这份感恩情怀激励着金兴安刻苦读书,努力工作,后来他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获得了“全国职工自学成才者”的荣誉称号。他还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写下了儿童文学集《校园微型小说》、小说散文集《自鸣钟》《我曾飞过》、报告文学集《安徽大采风》《火红的晚霞》《原上草》等18部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虽然环境、地位变了,感恩的心却始终没有变。2004年,金兴安回了趟老家,看到家乡在文化生活中的贫穷和落后,于是总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偶然间的一封信激发了他的灵感。那是一封中国作协号召全国作家为甘肃临潭县建立乡村作家书屋捐书的信。金兴安感到,让乡亲们用科学知识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是自己最好的报恩方式。于是,金兴安决定把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和多年积攒的数万元稿费 and 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为乡亲们创办一家书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积极帮助。

2005年10月28日,是一个令金兴安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创办的作家书屋建成并正式开馆,看着乡亲

们挤满了书屋,金兴安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金兴安发现,来借书的几乎都是学生和教师,很少看到农民在书屋。一问他才得知,农村的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大多不识字。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兴安决定再盖3间农民阅览室,让不识字的农民通过看光盘、看电视学习农业知识。于是,他把家里为儿子准备结婚用的2.3万元拿出来购买材料。当时正赶上合肥市进行大拆违,金兴安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购得了砖瓦、木材等旧建材,盖成了3间带走廊的农民阅览室。

书屋建起来了,但书籍太少了也是一个问题,金兴安便积极到处寻找书籍。现在书屋里的书籍,除了金兴安最早捐赠的那批,还有社会各界的捐赠图书——安徽省老干部、各地的作家、多家出版社都纷纷出力。金兴安说,中国作协联系众多作家捐书,多位作协领导为书屋题字捐赠图书,对作家书屋的发展帮助很大。特别是在2006年,中国作协和中国文学基金会从北京将6000册图书送到书屋,并将书屋纳入“育才图书室”工程。“创办这一家书屋,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是有了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无私奉献,才有了书屋的今天。”

为了维护秩序,书屋现有两位义务图书管理员在管理。其中,一位是在职教师,一位是退休的教师。在周一到周五的课外活动时间,在职的那位老师就来到书屋,帮助学生借阅图书。每逢集日,附近的农民都会到镇里来,那位退休的教师就得全天值班,为农民们看书、借书、观看光盘提供便利。金兴安说,图书管理员们大都是出于热心,他们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作家书屋自创建以来,文化普及效果得以显现。据图书管理员统计,蒋集镇作家书屋累计已有11万人次借阅过各类出版物。农民通过看农业、科技等书籍光盘,提高了养殖业、种植业技术,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同时,书屋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带动了当地乡风、民风的

改观。现在在村里,搞封建迷信的、参加赌博的、打架闹事的人少了,而进书屋读书看报的、科学养种的、邻里互相帮忙的人多了。

因为书屋就坐落在蒋集中学的校园里,学生们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蒋集中学近几年来不断攀升的重点高中升学率就是最有力的证明:2005年考入示范高中的人数仅为21人,到2013年增长到98人,是8年前的4.6倍。几年来,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多名考进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在当地传为佳话。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薛飞说,书屋是他中学时代最爱的地方。一下课,大家都会争分夺秒地跑到书屋,生怕自己想看的书别被其他人借走了。正是在那里,他爱上了阅读,爱上了知识,最终走进了北大。清华大学研究生谢亚男说,邂逅美是一种幸运,为少年创造邂逅美的机会是一种情怀。“若有天堂,必是图书馆的模样。何其有幸,我曾在故乡漫山遍野的春天里触摸过天堂。”

多年来,蒋集镇作家书屋已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并成为安徽省的示范书屋。回想自己创办书屋的历程,金兴安说,一个人做不了大事,可以做好事;做不了小事,可以出几个好点子;出了好点子,可以说几句话。他表示,将为书屋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令人欣喜的是,在建设农家书屋的道路上,金兴安并不是孤军奋战。农村地区的阅读问题一直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2007年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同中央文明办、农业部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至今已在全国建成了数十万农家书屋。在星罗棋布的农家书屋中,像蒋集镇作家书屋这样的个人自办书屋并不在少数,比如宁夏的“田野书舍”、山西老农的“文化大院”、湖北退休教师的“自办书屋”等。自办书屋红红火火的兴起,正成为我国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3年我国著作权登记量首破百万

据新华社电 2013年,我国著作权登记总量首次突破百万件,全国作品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2013年,我国包括作品著作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在内的著作权登记总量达1009657件,其中,作品登记845064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64349件,著作权质权登记244件,涉及主债务金额31亿72万6千元。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表示,著作权登记工作是版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著作人合法权益,保障版权交易安全,促进版权有效运用,推动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促进版权产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著作权等级制度从1995年起施行。近年来,国

家版权局不断加强著作权登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作品登记程序、作品登记证书格式内容,建立了全国作品登记信息数据库。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登记机构也将著作权登记工作作为本地区、本部门版权工作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宣传、重点拓展、改善服务,使登记数量不断攀升。

根据《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但是,由于著作权属于无形产权,在实践中通常会出现权利状况难以判断、权利状态不够清晰的问题,不利于权利人保护和行使权利。如果没有一套与自动保护原则相匹配的登记制度,会增加权利交易使用成本,也会使权利人在遇到纠纷时付出更高的代价。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著作权登记制度。(徐 砾)

《满巴扎仓》聚焦民族文化资源保护

本报讯(记者 王冕) 2月21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文联、作协共同主办的内蒙古作家阿云嘎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王金喜、主席巴特尔,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宣布扎布和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包明德主持。

阿云嘎用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由翻译家哈森译成汉语,并在2013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让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深受鼓舞。小说围绕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王爷府的权力之争展开故事,讲述了满巴扎仓的医生喇嘛们为了保护蒙古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元上都药典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一部蒙药秘典被清朝朝廷秘密追查,引起了从皇室到草原上的王爷再到民间各路人马的猜测、贪念和疯狂找寻,于是满巴扎仓寺院就成为一个深不可测的迷局。作品在一种探秘解密的气氛中打开了故事的宝盒,意境如高原般深远,叙事质地则似草海般湿润。

与会者认为,《满巴扎仓》展现了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图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小说塑造了一群为保卫蒙古民族文化而舍生取义的医生喇嘛形象,人物众多,性格鲜明,情节引人入胜,故事矛盾冲突尖锐。作品结尾设计巧妙、浩然大气,将珍藏几代的蒙古药典以手抄经卷的方式广布天下、治病救人,展现了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团结和谐和仁爱天下的情怀。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作品所呈现的文化开放姿态,为挖掘、保护、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与会者还对《满巴扎仓》精到流畅的译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对母语进行汉译而不失民族特色的风格样式,对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山东省作协推出第三批签约作家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作协第三批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10名中青年作家正式签约,自此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总数达到30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代表省作协与10位签约作家签订了协议书。签约仪式由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主持。

此次与山东省作协签约的10位作家是刘照如、闵凡利、凌可新、寒烟(刘燕)、韩宗宝(韩增宝)、孙方杰、简墨(陈剑霞)、耿立、陈原、莫问天心。他们创作实力深厚,创作潜力较大,多种体裁并重,风格特色明显,是山东省中青年作家的优秀代表。

孙守刚说,实施签约作家制度,是培养优秀骨干作家、催生文学精品、推动文学繁荣发展的有效工作机制,应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全力推进。他希望第三批签约作家坚持正确导向,弘扬时代精

神,提升创作格局,树立高远目标,深切关注现实,深入火热生活,不断开拓创新,潜心创作精品。

杨学锋表示,签约作家要明确定位,争当全国一流作家,明确任务,潜心打造精品力作,注重学习,努力提升创作品质,加强修养、坚持德艺双馨,加强沟通、积极参与作协活动。山东省作协要不断创新和加强服务管理,进一步把签约作家工作做好。

据介绍,签约作家制度实施5年来,山东省作协在激发创作活力、鼓励精品创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5年来,第一、二批签约作家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和其他体裁文学作品75部,在国家级及以上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93篇(部),284篇(部)作品被重要选刊转载或入选多种重要文学年选、选本,在全国各类重要文学评奖中获奖23次,进一步提升了山东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鲁文)

“经典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吴义勤

现在媒体上流行一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冷嘲热讽的稀奇古怪的言论,其核心一是否定中国当代文学有经典、有大师,二是否定批评界、学术界有关“经典化”的主张,认为在一个无经典的时代,“经典”是怎么“化”也“化”不出来的,“经典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命题”。其实,对于文学,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理解,这很正常,每一种观点也都值得尊重。但是,在经典和经典化这个问题上,我却不能不说,上述观点存在对“经典”和“经典化”的双重误解,因而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与危害性。

就“经典”而言,否定中国当代文学早不是什么新鲜事,对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态度在很多人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我不想争论这背后的是与非,也不想分析这种观点背后的社会基础与人性基础。这种观点单从学理层面上看就已陷入了三个巨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误区。很多人把经典想象为一个绝对的、神圣的、遥远的文学存在,觉得文学经典就是一个绝对的、乌托邦化的、十全十美的、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阻隔当代文学和“经典”这个词发生关系。经典既然是绝对的、神圣的、乌托邦化的、十全十美的,那我们今天哪一部作品会有这样的特性呢?然而如果回顾一下文学史,有这样特性的作品好像也没有。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十全十美,也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所有人喜欢。因此,把“经典”这个概念无限地放大,无限地夸张化、绝对化、神秘化、神圣化、乌托邦化,其实是我们故意制造的一个拒绝当代文学的借口。

第二个误区,是经典会自动呈现的误区。很多人会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对文学来说,文学经典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够实现价值,没有被阅读的作品、没有被发现的作品就没有价值,就不会发光。而且经典的价值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部作品的价值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那这部作品的价值就一定有限的。经典一定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读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所谓文学永恒性的来源。也就是说,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它的某一个意义、某一个价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义、价值的永恒再生性,它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可以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这才是经典价值的根本。所以,说经典不但不会自动呈现,而且一定要在读者的阅读或者阐释、评价中才会呈现其价值。

第三个误区,是经典命名权的误区。很多人把经典的命名视为一种特殊权利。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现代人还是后人具有命名权;二是权威还是普通人具有命名权。说一个时代的作品是经典,是当代人说了算还是后人说了算?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后人说了算,我们宁愿把一切交给时间。但是,时间本身是不可信的,它不是客观的,是意识形态化的。某种意义上,时间确实会消除文学的很多污染包括意识形态的污染,但是时间也会增加很多污染。此外,如果把一切交给时间,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后代的读者要有足够的信任,要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使命。但我们对后代的读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我们今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阅读危机,我们怎么能寄希望于后代人有更大的

阅读热情呢?幻想后代的人用考古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进行经典命名,这现实吗?

此外,在经典命名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当代作家究竟为谁写作的问题。当代作家是为同代人写作还是为后人写作?幻想同代人无阅读、不接受的作品后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更何况,当代作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还是后人更能理解?当然是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人更重要。第二个层面,就是普通人、普通读者和权威的关系。理论上,我们都相信文学权威对一个时代文学经典命名的重要性,但我们又不能够迷信文学权威。如果把一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命名权仅仅交给几位权威,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几个人的错误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错误,几个人的偏见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偏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文学史教训。

我们既要相信权威又不能迷信权威,我们要追求文学经典评价的民主化、民主性。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判断应该是全体读者共同参与的民主化的过程,各种文学声音都应该能够有效地发出。这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互补性的阅读。为什么叫“互补性的阅读”?因为一个批评家再敬业,再劳动模范,小人也读不过来所有的作品。举个例子:3000部长篇小说,一个批评家如果很敬业,每天在家读24小时,他能读多少部?一天读一部,一年也只能读300部。但他一个人读不完,不等于我们整个时代的读者都读不完。这就需要互补性阅读。所有的读者互补性地读完所有作品。在所有作品都被阅读过的情况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发出来的情况下,各种声音的碰撞、妥协、对话,就会形成对这个时代文学价值比较客观、科学的判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普通人同样有着对经典进行命名的使命、责任和权利。

就“经典化”而言,有些观点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学理缺陷,体现了对“经典化”本身的无知与误解。“经典化”不是要简单地呈现一种结果,不是要简单地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排座次,不是要武断地指出某部作品是“经典”、某部作品不是“经典”,不是要颁发一个“谁是经典”的“荣誉证书”,而是要进入一个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呈现文学价值的过程。所谓“经典化”的“化”实际上就是文学价值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哪怕你是一个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者,你可以不承认当代文学有经典,但只要你还承认有文学,你还需要和相信文学,还承认当代文学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影响力,你就不应该否定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性。没有这个“经典化”,当代文学就不会进入和影响当代人的生活,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每一个人,哪怕你是权威,你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剥夺他人阅读文学和享受文学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当然是一个真命题而不是一个伪命题。

北京人艺《茶馆》将赴三地巡演

本报讯(记者 徐健) 记者日前从北京人艺获悉,话剧《茶馆》将于2月底至3月中旬赴郑州、青岛、天津三地演出。这是继去年《茶馆》开启巡演序幕赴深圳、武汉、重庆演出后,再次赴外地演出。北京人艺表示,除了每年在首都剧场的驻场演出外,让这部久经舞台磨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不断走出去,已成为北京人艺艺术生产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600多场演出的《茶馆》已经影响了几代观众。1980年,北京人艺携《茶馆》赴西欧演出,是北京人艺第一次将《茶馆》和中国话剧的水平展示给世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茶馆》巡演的足迹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国内多地,成为目前为止北京人艺外巡回演场次最多的剧目。

据介绍,此次《茶馆》的巡演延续了去年三地巡演的形式,在国内最大的城市剧场中,集中选择了河南艺术中心、青岛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等3所北方城市的剧场。北京人艺在此次巡演前进行了详细考察,以保证演出场所与剧目本身的适配程度。未来几年,《茶馆》将陆续走遍全国,并计划沿着上世纪80年代世界巡演的路线再次走出国门,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用耳朵“阅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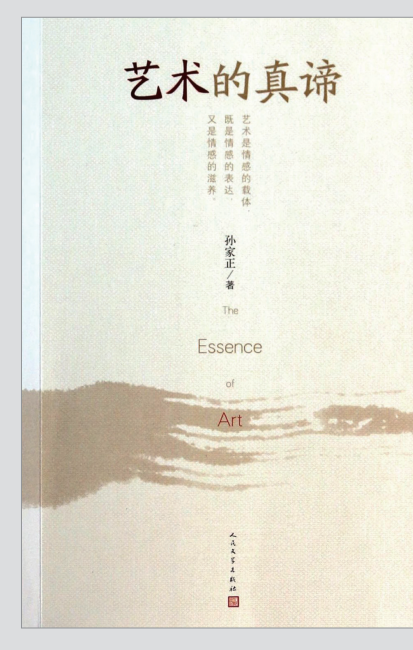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近日,中国文学界第一篇由作家本人配音朗读的有声读物由多看阅读网推出,这就是作家蒋一谈的短篇小说《透明》。这篇由蒋一谈本人亲自朗读的有声读物,时长50余分钟,单价2.99元,是蒋一谈为读者“私人订制”的有声阅读作品,以供读者直接购买下载,体验用耳朵进行“阅读”。在该网站的“小说”专区里,这部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对于尝试推出作家亲自配音有声阅读作品的现实意义,多看阅读网内容策划负责人表示,中国至少有1亿人喜欢收听有声读物,这个数字比美国多一倍。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耳朵听而不是用眼睛阅读。有声阅读的兴起,特别是短篇小说有声阅读的兴起,对阅读生态和阅读推广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借助智能手机的推广,移动听书和有声阅读可以让人随时进入阅读的别样世界。据统计,到2015年,移动阅读的活跃用户预计可达6.5亿,这为文学走向大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蒋一谈的《透明》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城市中中年男人在生活、事业和情感上的复杂情愫。该作于2013年第4期《人民文学》发表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和2013年度多种短篇小说选本,得到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好评。蒋一谈的朗读声情并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读者的沟通。据悉,他本人还将继续配音录制之前创作的《鲁迅的胡子》《林荫大道》《公羊》《随河漂流》《中国鲤》等短篇作品。

新书贴

《艺术的真谛》
孙家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的诗文集,收录其散文和随笔等各类文章41篇、诗歌50首,其中不少系首发。作者的文章来自对生活的观察,有感而发,文字真挚朴实,能够以小见大,注重言外之意,意味无穷。他的诗歌趣味纯正,感情真挚,注重内在的旋律感,保持着诗歌本质的特质。

